

◎南京保卫战中,马桶曾立过大功;同在民国时,它又是一场官司的导火索

◎上世纪30年代,南京还有专营粪生意的“马子洋行”

◎旧上海除了青帮,还有“马桶帮”

# 马桶的故事 很“黄”很暴力

现代生活的方便快捷,让都市人早已渐渐遗忘了马桶这一老物件的存在,但在民俗专家的眼里,正在从人们生活中消失的马桶,其实也是一种文化——“方便文化”,从它能看到历史的民风、民俗、社会生活。就连过去剃头时,师傅都会问一句:“你剃西装式、平顶式,还是马桶式?”

只有将马桶放到历史的坐标中,它的形象才能逐渐清晰丰满起来——



青瓷虎子

铜虎子

酱色釉瓷虎子

这三个虎子均是南京博物院的藏品 快报记者 辛一 摄

## 七桥瓮下马桶立功

南京光华门外,有一座古桥横跨秦淮河,这就是建于明代的七桥瓮。它与明城墙、明城堡的风格统一,修建之初即被赋予了军事防御的使命。600多年来,虽然风云变幻,七桥瓮却一直恪守自己的使命。1937年,南京保卫战中,这里就成为保卫南京城的一道军事防线。

当时,上海等地相继失守,南京危在旦夕。七桥瓮已成为前沿阵地,唐生智调了两个营的中国宪兵把守七桥瓮一带。600多名中国宪兵,每个人要防守25米长的阵地,迎击50名日本兵的进攻。

这一仗打得很艰苦,为了拖延日军,争取撤退时间,唐生智就想了一个办法,向老百姓紧急征用马桶。打仗征用马桶做什么?原来,这几百个马桶被装满炸药,密密麻麻地浮在七桥瓮下的水面上。日军深知七桥瓮的战略地位,不敢用飞机和重武器,生怕引爆装有炸药的马桶。

马桶为后方撤退赢得了时间,可是唐生智却因擅自用中国宪兵,被蒋介石狠狠责骂。原来,中国宪兵是国民政府于1927年秘密组建的“委员长特别卫队”,这支部队共4000人,全部是从200多万军人中经过层层筛选、并接受过德国纳粹特种部队教官魔鬼式训练的精英强将。中国宪兵配备全套口式装备,是当时中国最为精锐的部队,蒋介石规定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调用。

唐生智挨批后,不得不把中国宪兵撤离七桥瓮和雨花台防线。结果当晚,日军突然出动大批轰炸机,对中国宪兵的营地进行狂轰滥炸,中国宪兵死伤惨重。第二天,蒋介石就命令唐生智撤退,放弃七桥瓮。很快,日军就攻入了南京城。

20多年后,攻打七桥瓮的日本甲种师团梅村师团长,在回忆录里向后人讲述了这场战斗:



清晨赶着大车收马桶的情景,如今只能在老照片中看到 扎西刘 供图

“……(中国军人)除了有很强的攻击力和防御力外,还能抓住我们的战略心理弱点,用排排粪桶装上炸药,隐藏在秦淮河面的桥下,一桶爆炸,桶桶相应,简直是粪桶雷……”

今天七桥瓮一带,已经成为供市民游乐的湿地公园,很少有人知道,在70多年前的那场战斗中,马桶也立下过战功。

这段故事,是民俗学家扎西刘偶然听一位抗战老兵谈起的。扎西刘是民建省委江苏委员会的副主任,他的“专业”是民俗研究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马桶进入他的视界,于是他走四方、访老人、查文献,开始了一场长达六年的“马桶考古”。听完抗战老兵讲述的故事后,他开始到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、大屠杀纪念馆等地搜寻资料,才又钩沉出有关马桶的这段故事。

但当记者细细考据历史时,却发现当时守卫七桥瓮和雨花台一带的并不是中国宪兵,而是另一支部队。虽然具体当事人的身份存疑,但马桶守桥的故事却带着战争的硝烟流传开来。

## 马桶本来不“姓”马

马桶本不姓“马”,它原名“虎子”。《芸窗私志》中记载,传说有座山叫神鸟,山上猛兽众多,麟兽最厉害,连兽中之王老虎都对它服服帖帖的。每次麟兽小便时,老虎就伏在地上,抬起头,麟兽就把小便撒入虎口中,所以便器就叫虎子。

麟兽究竟是种什么猛兽?扎西刘告诉记者,他去河南焦作作的龙洞乡、王封乡,当地流传着一个“龙虎斗”的传说。说是焦作山有很多老虎,常冲到山下,山民生活不得安宁。山民就祈祷更凶猛的大兽降临,把老虎消灭。果然,一日有大麟兽出现,它和老虎大战七四十九天,降服了老虎。为了防止老虎钻下山扰民,麟兽小便前,就让老虎伏在旁边,随时检查它的行踪。后来,老百姓就称麟兽为“龙”。扎西刘说,类似的传说很多地方都有。

虎子因何“改姓”为马,民间流传不同说法。一是说因为李渊的四子小名叫虎子,为避讳,人们就改成便器虎子为“马子”。另有一说,是隋末叛将马文举砍了隋炀帝的头,并把它插在便桶上,拎着马桶和人头就上了扬州大街,以示公众。于是后来就依马文举之姓,把虎子改名为“马子”。

扎西刘在扬州搜集马桶资料时,听当地年长的人讲,马桶外刷

紫红漆,做成扁肚腰鼓形,也与隋炀帝有关。隋炀帝奢侈无度,民不聊生,百姓怨声载道。特别是他每次下扬州观琼花,老百姓就像被剥了一层皮。于是人们模仿他的大肚子,把马桶做成腰鼓形,并按他的皇服颜色,把马桶漆成紫红色。天天骑在“皇帝”头上拉屎拉尿,用这种方式发泄对他的仇恨。

“还有更厉害的,人们把河中的螺蛳、水一起放到马桶里,用刷子刷,因为刷声与扬州话‘杨广’两字发音类似,再‘咣’一声把桶中的螺蛳和污水泼出来,口中喊道‘屎去吧’,意思就是‘杨广死去吧’。”

## 下关正丰街的真名是“郑粪街”

扎西刘还给记者描述了一幅上世纪初南京的粪便运输地图:城中每个居民区都有专门的粪夫,负责每天收马桶、洗马桶,集中把粪送到专门的“粪行”去;秦淮河沿岸,都有小一些的粪船,它们接收两岸住户的粪便;惠民河是秦淮河的尽头,小粪船顺秦淮河来到惠民河,把粪便集中在惠民河的“粪市”里,再由大型粪船运走。可以说,惠民河的“粪市”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此类交易市场之一。

“你知道吗?今天下关的正丰街,其实原名叫‘郑粪街’。”扎西刘见记者瞪大眼睛吃惊的样子,又加了一句,“那儿以前还有一个‘马子洋行’。”扎西刘的舅舅住在老城隍庙,他小时候常跟着舅舅泡澡堂,“每次去泡澡堂,舅舅都要和人聊聊老南京的典故,‘郑粪街’这个典故就是从他们那儿听到的。”

原来,上世纪30年代,正丰街上有两家粪行,一家老板姓郑,拥有100多辆粪车。每天清晨,粪夫们收集好自己负责区域内的马桶后,都要从郑家粪行门前一一过数,拿竹排月底结账。粪车、马桶、粪夫天天穿梭在郑家粪行门前的大街上,久而久之,铁匠铺、木桶坊、油漆行、洗澡堂都开在旁边,沾粪行的人气做生意。于是人们称这条街为“郑粪街”。“粪”入街名,有些不雅,后来就改为“正丰街”。

而另一家粪行,老板姓马,他家专门做粪便批发,被戏称为“马子洋行”。“就是将集中起来的粪便,统一装船,分销到各地去。”扎西刘告诉记者,安徽农村是南京粪便的主要“销售地”,“以前农村人少,粪便也少,不够给田施肥,所以城里的粪便是抢手货。”每天早晨,粪行前就是马桶的世



酱色釉瓷虎子

界,粪夫把收来的粪倒在“马子洋行”前的大粪池里,集中到一定程度,就通过毛竹管子,“发货”到船上,再运走。

“1937年以后,‘马子洋行’成为日本宪兵的养马场;1945年后,成为陆记运输行,主要从事粪包车生意和运输业务;解放后,就成了下关区热河路街道办事处。现在,‘马子洋行’前的大粪池早已经没有了。”

## 一桩由马桶引发的官司

上世纪30年代,时任江苏省教育厅主任秘书的易君左因为写了一本《闲话扬州》,犯了扬州人的众怒,惹下一身官司。但很少有人知道,这场官司其实是由马桶引起的,而且易君左与扬州人的这场纠葛,一直持续了四十年,直到他死了,事情还没完。



为了马桶,易君左不得不在《申报》上公开道歉 资料图片

扎西刘也是从一次谈话中,了解到这段马桶公案的。本世纪初,扎西刘父亲的一位老同学从台湾回乡探亲,“他来看望我父亲时,我在旁边作陪。”扎西刘说,“这位伯伯是台湾的一位大法官,听说我正在研究马桶,顿时来了兴致,对我说,‘有一个与马桶有关的案子,蛮有意思的。’”

1932年,“一·二八”上海抗战爆发后,江苏省政府奉命北迁,教育厅迁到了扬州。被称为“龙阳才子”的易君左,无事之时就爱在扬州大街小巷闲逛,体察当地的风土人情,后来就写下《闲话扬州》一书。其中有篇文章写道:“……然而马桶又非常的多,每天上午都是马桶的世界。”

扎西刘说,文人骂人不带脏字,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,易君左其实是在嘲讽扬州是“屎(世)界”。

此外,易君左还在书中描写了“挑粪桶的男子与倒马桶的女人,一边刷一边舀一边嬉皮笑脸地谈天”的场景,同时感叹,“扬州是个产女人的地方”,“近水者多烟花水性”,“人性轻浮活动,女人尤然”。

《闲话扬州》出版后,引来众怒,于是扬州人就把易君左和出版社告上法庭。其中的领军人物,是扬州妇女界的著名领袖郭坚忍。她发起“扬州各界追究《闲话扬州》联合会”,向镇江地方法院递交了诉状。

这场官司打了大半年,最后易君左不得不在《申报》上公开道歉,并辞去公职。出版《闲话扬州》的上海中华书局,也被要求收回已上市的书,并销毁书版。

十几年后,易君左到了台湾。他以为远离扬州,又过去这么长时间,不会再有什么麻烦,于是在台湾《中华时报》上发表《六十沧桑》一文,再次提到当年的《闲话扬州》。谁知文章见报后,立刻招来在台的扬州人不满,他不得不再次公开道歉。1972年3月,易君左去世了,两个月后,台湾《春秋》杂志为纪念易君左,重新刊登了《闲话扬州》,依然引起扬州同乡会的谴责。这一次比上两次还要热闹,甚至还引发了流血事件。

## 旧上海除了青帮还有马桶帮

很多人可能不信,倒马桶的还会有帮派?

扎西刘告诉记者一组统计数据,20世纪30年代左右,上海有400多万人口,每天产生1200吨粪便,粪车1900辆,粪码头22个,粪夫4000多人。这样庞大的社会职业结构,光靠各自为阵肯定不行,久而久之便产生了各种马桶帮派。

那时,为了城市卫生着想,当局决定出钱置办粪车,雇佣工人来为居民倒马桶。粪便可以施肥,是当时的“软黄金”,于是商人马鸿记看到这个商机,就申请承包粪便的处理工作。他做了600多辆粪车出租给粪夫,收取租金。粪夫主要是江苏各地的农民,他们为了免受地头蛇的讹诈,也寻求粪头的庇护。

除了马鸿记,王荣康也是当时有名的“粪大王”。其他商人也纷纷涌入这个“新兴行业”。人多了,自然要争地盘。粪头们为了守住自己地盘,雇佣打手,形成了不同的马桶帮派。据了解,当时主要由苏北帮、苏州帮、江南帮三大帮派。每个帮派都有帮主,人称“老头子”,每个粪夫必须要到“老头子”那里去登记、租车、分段、完捐。完成这一系列手续后,他们就分得某条马路或某条弄堂做地盘。

粪夫们是这个“产业链”中最底层的人,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活,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很低,就连茶馆都不让他们进去。

但是,地位卑微的粪夫们,在上世纪40年代还掀起了一场维护自身权利的“民主”运动。1945年后,上海物价飞涨,赋税加重,其中有一项就是加收粪税。粪夫们的生活本来就是勉强自保,加收粪税就是把他们往死里逼。于是,粪夫掀起了“马桶总罢倒”行动,要求免税。这场行动遭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制止,粪夫只能通过收取更高的费用,来消化粪税。可是百姓怨声四起,各大报纸向政府抗议。无奈之下,政府只好发出“限价令”。

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赵晨